

黄胄参与钓鱼台重建(上)

◆ 郑闻慧

病房成了“画室”

黄胄在 1977 年 4 月住进医院，病重得连脚步移动一下都困难，走路要两个人搀扶。回想起来他的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偶然的。早在 1970 年他就说：“经常半身麻木，下床时偶尔有摔倒之势。”后来我才知道，1967 至 68 年每次揪斗总政治部的萧华、傅钟、刘志坚和军博的领导贾若瑜，总把黄胄拉出去陪斗，说是他们培育了这个“反革命驴贩子”。而斗完了，造反派就七手八脚把他往车上一扔。黄胄有时候还忍受着扭脖子挨头的痛苦。随后就是过度的劳动，愣头青的战士们从卡车上往他肩上卸水泥也是扔，一袋刚完又是一袋，有时几乎要把他压趴下。这样就伤害了他的颈部，致使第二到第六节颈椎都产生了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以致半身麻木疼痛。更由于没有及时治疗，留下了愈来愈大的隐患。

1978 年 8 月，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要出访南斯拉夫，对国家和外交部来说这这可是粉粹“四人帮”以后代表国家外事活动的一件大事，送什么礼品给南斯拉夫元首首先请了也是个重要问题。听说先是请了几位大画家作了不少的画，想在里面挑一张，而有关部门都不满意。后来不知是谁提出让黄胄来画，我想提出这个意见的人当时是不知道黄胄的病情，否则就不会提了。但黄胄和友谊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极兴奋，大家问他行不行，他说可以，但要练一练。那时的病友李昌安要求倪志福为黄胄造一个能推能拉的画板，是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做的。他们以起重机的原理为

本文作者系国画大师黄胄的夫人，1931 年生于陕西，现任炎黄艺术馆馆长。她撰文深情回忆了黄胄“文革”后复出，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成就第二个艺术高峰的前前后后。文章发表在《档案春秋》2014 年第 7 期上。

他设计制作了一架能伸能缩的斜面画架，但出访的日子太近了，这个起重机式的画架没赶上这次用。他只好要求友谊医院给他开一间稍微大一点的房间，找一张大桌子让他做临时画室。

7 月 23 日是大暑，天气格外闷热。一大早，医院为黄胄准备了一间“画室”，里面放了两个乒乓球台，成了临时画案。我们在扶手椅子上放了五六个枕头让他坐上去，也就和站着的高度差不多。他笑着说：“铺一张八尺大纸来，我为他画一群骏马。”画马当然是黄胄的拿手好戏，但是那支该死的毛笔用三个指头握不住，在纸上莫名其妙地倒下了，纸上出现了一个大水墨团。他很难过，又说既然这样，我要以叶老师的诗为主题画一张“雄鹰”。我们又换了一张纸，黄胄改变了以前拿笔的方法，他干脆满把握住毛笔在纸上一片一片地戳羽毛，奇迹般地竟然戳出来一只头歪向旁边观看的雄鹰。这时大家都热得不行了，他更是大汗淋漓了。在那个年月里好像北京市除了钓鱼台国宾馆有空调，哪儿都没有空调呢。



■ 黄胄作品《欢腾的草原》

“英雄老去心犹壮”

在场的人都高兴地拍手为他祝贺，让他在一边休息。但我忍不住跑了出去，在楼道里放声大哭，原来是那样的强壮，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几个热心的大夫、护士和朋友都来安慰我，我抬头一看，我的女儿梁缨也在另一个角落里哭泣。黄胄发现我们在哭，便叫我们站到他身旁。他全然忘记了病痛，沉浸在攻克难关后的欢乐之中，有说有笑，我们被他的笑语感染，才得到了安慰。

吃了午饭我让他睡一会儿，但不到两点钟他又催我们上楼。他说画画如果不能一气呵成，过两三天再看，一定觉得不满意就会干脆撕掉，那么上午的劳作就算白费了。我们觉得也有道理，而且知道他有这个撕画的习惯。下午主要是画松树和鹰的嘴、眼、爪子，尽管松枝是比较好画的，但鹰的嘴、眼、爪子，是要求极为准确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四肢轻瘫的人来说真是够呛。他已看出我们的心思，说：“你们不要看我点不燃烟，把香烟放在嘴里有困

难，说不定托叶老师的福，我会画得很准确呢！”我们看他憋住气，全神贯注在画嘴、眼，又抽了一支烟画爪子。围观的人也大气不敢出，一点儿声音都没有。谁都知道嘴、眼、爪子画不好，这张画也就算废了，他要不精心或握不住笔也就完了。画完了这一部分，真是奇迹出现了，没有出任何差错，大家无不兴高采烈。等画松树时我们实际上已知道这幅画完成是不成问题了。但是他也精疲力竭了，不想再画松针了。他说：“闻慧、梁缨，你们来画。”但那时我们怎么敢？他又勉强画完墨稿，坚持说你们谁都可以着色，如果坏了我再给你们收拾。这样在这幅画的下边松枝部分有一些是我们几个画的，后来叶剑英元帅真的为他题了两句诗：“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

那天下午香港《美术家》杂志的主编黄茅来过，他在外面走廊上也流了眼泪，把这些亲历的见闻感受写了报道。下午五点钟外交部来的人握住黄胄的手说：“你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拿走了这张画，我流出了眼泪，而黄胄腼腆地笑了。

8 月 22 日六点钟，就有病友从

新闻联播里听到向南斯拉夫所送的国礼是一张 110 厘米×170 厘米的中国画《松鹰图》，病友们纷纷向他祝贺。后来我们又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但他的脸十分严肃，一点儿笑容和得意的表情都没有。我想他是在为他的健康而着急啊！当天晚上我们从电视上看见了那幅画，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别人就开始争论外交部给不给报酬，黄胄说他不要什么报酬。我当然赞同他的意见，因为我们想这本来就是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份内的事嘛。再说黄胄身患重病，他的劳动哪里是一点物质报酬所能补偿的！他让我把不要任何报酬的意见转告了外交部和文化部。

从秋天以后，他的病好像有些减轻，自己能够穿袜子了，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十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恢复了职务，不久就出现在足球赛场的看台上，并出席了八一招待会。这些政治上的喜事使我们异常高兴，也让黄胄忘记了疾病的折磨。

但是这时却听北京画院的几个人说黄胄的病最近加重了，有的说他瘫痪了，有的说他因为饮酒过量中风了，有的说他一辈子也好不了。我们分析大部分是出于同情和惋惜，但也难免有些人在说风凉话。就在这段时间里，北京美协展览的他与蒋正鸿合作描写海南岛妇女在树林里劳动的一幅大画，在北海公园展览会上给弄丢了。还有他给轻工部礼堂画的《库尔班·吐鲁木》，即《日夜想念毛主席》，挂在礼堂里那幅大画，也丢了。这说明有人认为他一辈子也画不了画了，所以才下手拿走了他们认为是黄胄最后“绝笔”的主题画，以便日后卖个大价钱。

牙齿与健康

赵哲昉

9.牙周病是身体疾病的信号

以吃饭为例，现在的人往往急着嚼也急着吞，吞咽时就必须盖住气道，随时准备让尚未充分咀嚼的食物吞入食管；等到食物吞下后，又急着在吃下一口饭菜的空闲用嘴巴吸入宝贵的空气；然后，又是急着嚼着吞。进食时，气道会让礼让食管，以利食物通过，所以吃饭时几乎等于是一直憋着气，吃完饭身体的血氧量降低，脑部一缺氧自然容易昏昏欲睡。要知道，人体所需的氧气有 25% 以上为大脑所用，大脑是生命中枢，不能因为进食而将氧气礼让给消化器官。但现在的人们太过忙碌，不仅因进食的习惯异常导致身体缺氧，甚至还边吃边讲话，等于是边吃饭边吐气，加重了缺氧的情形。这种情况下，餐后想睡觉还算好的，只怕有不少人是缺氧快到快昏迷了。

除了吃饭，你不妨想象一下，走在路上匆忙的行人、地铁车厢里挤成一团还忙着说话的焦虑乘客、总是屏气凝神关注着电脑屏幕的上班族，是不是都几乎忘了好好呼吸呢？缺氧的情况下，不正给了厌氧的牙周病细菌发展的条件吗？

我有很多病人都是老师。老师通常自我要求较高，对口腔卫生的照顾往往不是清洁不足，反而是刷牙过度。这种状况比比皆是，从大部分老师都有牙齿损伤和齿颈部磨耗就可以看出来。绝大部分的老师责任感强，对学生的无私关爱往往远超过自己身体的负荷，经常一心扑在学生的课业上，没时间吃午餐，导致肠胃不好，遇事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甚至成了老师的职业病，老师的牙齿颜色常因胃液反流遭到酸蚀，颜色偏黄，间接导致牙齿容易磨耗。长期的临床经验中，我还发现老师患牙周病的比例也较一般民众来得高，经由长期大量口腔 X 线片的观察，我发现这与老师的工作性质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是工作环境缺氧，老师在教室上课时，需要跟众多的学生分享教室那些仅有的空气；其次是呼吸较浅，老师因为需要持续性



一看一个准！

地讲课说话，甚至被迫过度用力将话说得很大声，空气常常还没有吸到肺部，就又从老师的嘴里“说”了出来。这些情况都造成了口呼吸的习惯，造成进入肺部的氧气不足和利用率降低。再加上老师特别有责任感，心理压力让身体里面的氧气消耗得特别快，供给不足又消耗过快，因此老师较一般人容易得牙周病。

牙周病是身体疾病的信号。将对老师的观察移到一般人身上，我赫然发现，缺氧竟已是普遍的问题。台湾能量医学会研究报告显示，绝大多数疾病都源自缺氧与体内高酸性环境。譬如，当肺部功能低下或气体交换率下降时，由于代谢后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无法排出而滞留于细胞内，造成血液酸化，久而久之，导致营养吸收不良和氧气不足，细胞或组织本身的功能日益衰退，很多局部的器质性慢性病和各种症状便逐渐浮现出来。

明白了导致牙周病的各种原因后，再回过头来看牙周病这个疾病本身。牙周病主要发生在牙齿与牙龈交界的位置，这个位置一般称为牙龈沟。当牙龈沟缺氧，且免疫系统没有发挥作用时，会让厌氧细菌繁殖，并对牙周组织造成破坏。一开始会牙龈红肿，再严重一点，骨骼会遭到破坏，当骨骼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支撑牙齿，这时牙齿就会开始动摇，最后会整颗掉落。缺氧所导致的牙周病，是身体开始严重缺氧的征兆，此时要注意身体是否已经潜藏了各种疾病发生的可能。

牙周病会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牙周病是慢性疾病，大部分病患初期都没感觉，所以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等到牙龈红肿、疼痛，已经很严重了，才晓得得了牙周病。牙龈红肿会影响美观，牙齿破坏严重的话甚至需要拔除。拔除牙齿就会造成咀嚼功能低下，除此之外也会造成咬合能力高度丧失。牙周病还会使骨骼遭到破坏，牙齿的骨骼就如同牙齿的地基，遭受破坏时，上方的牙齿就会移动，一移动后牙齿排列就会不整，影响美观。另外，牙周病会让口气不好，也会造成身体其他系统的疾病，譬如呼吸系统疾病、骨质疏松症、心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即我们通常说的“老年痴呆症”）、孕妇早产、糖尿病等。

12.寒冬腊月刮“秋风”

日本鬼子侵占上海后，对英、法租界心存觊觎，然而无可奈何，而对非租界区域控制愈来愈严密，两种手段，双管齐下：1.通过伪政府，建立乡、保、甲制，颁发“良民证”；2.增岗设卡，检查来往路人。

朱家湾地处沪杭铁路与沪宁铁路分岔之间，日寇分别在沪杭线道口（现今光新路）和沪宁线道口（现今交通路）设立关卡。关卡拉着铁丝网，仅留有两米宽的进出口，守卡鬼子兵荷枪实弹，胜过凶神，来去百姓经过这儿，必须脱帽鞠躬，稍一迟缓，便挨枪托。沦陷区的百姓受尽凌辱，无力公开反抗，只能饮恨于胸。

朱家湾棚户区，类属伪市政府北新泾区太平桥乡，乡长已派定，正在筹划下属基层组织。包氏夫妇想找靠山，两口子一致认为良机来了，弄个保长当当，于是，去找爷叔活动。正巧，太平乡乡长袁祥卿是爷叔昔日的同窗，爷叔拍着胸脯满口应承。包兴旺备下一份厚礼，带着爷叔的推荐信，登门拜访乡长。袁祥卿近日正在琢磨朱家湾的保长位置由谁来坐？……棚户区无理弄名称、无门牌号码，居民来自四面八方，难缠户较多，得觅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看罢推荐信，正中下怀，来者又是草帘厂老板，落得卖个老同学情面，当场拍板，委以保长之职，管辖前浜和后浜。草包选择了这位置，这位置也选择了草包，二五一凑，便成十（实）。

包兴旺得到保长实位，尽管不属伪政府人员，但可算是“一方土地爷”。他领来开创经费，设立办公室，还从家乡聘来一位绍兴师爷后代孙一鸿当保干事，按人员定额，尚缺一跑腿的保丁，此职务由谁来担当？一时拿不定主意，夫妻俩商来议去，肥水不流外人田，最后选中儿子包德彪。这位小开，游手好闲，拈花惹草，爷娘用心良苦，想把他箍在身边，免得在外惹是生非。

人手配齐，立马行动，首先为弄堂取名称、为住户编排门牌号，然后以 20—30 户人家为基数，编成“甲”，甲长由保长指定其中某一户主担任，不得推辞。登门入户，逐一登记填表每家的人口，登记时讲明：不得漏报，尤

为 16 岁以上的居民，漏报了领不到“良民证”。这段时间，说来也够忙碌的，从着单衣忙到穿棉袄，保丁用摩托车载着保干事，走遍前、后浜每户人家，历时数月，登记手续告一段落。孙一鸿很得意，将登记表格以“甲”为单元，装订成册（如果这些册本尚存，毫无疑问，那是棚户区最原始的户籍资料）。

包氏夫妇铁算盘打得“噼啪”响，买卖人，说千道万，不做蚀本生意，谋得保长位置，送出厚礼；区长儿子结婚，乡长女儿出嫁，又连连奉上重金，这些都是投资成本。一枝花怎能放弃捞钱的机会，她出主意，要为新上任的保长做寿，连本带利捞回来。

包兴旺说：“我 43 岁，小生日不作兴做，外加生日已过脱哪。”

“依真是个草包加笨蛋！缩脱 3 岁，不就是大生日啦。啥人还查啥咯辰光生咯。”

草包拍着笨脑袋，夸奖老婆头脑活络。二人选定日子，请孙一鸿照户口册本填写红帖，填后由儿子送至辖区内每户人家，并讲明做寿那天同时发放“良民证”。

居民收到红帖，怨声载道，明知是保长变相勒索，仍不得不勒紧裤带前出去“人情”。腊月初五这一天，草帘厂歇工，厂房改作“流水席”场所，厂门口设一账桌，孙一鸿坐镇，一边收钱，一边发证，满 10 人，入席用餐，川流不息。席上四凉八热，统是廉价的家常菜，量不少，足够四个饱。

沈老夫子胸藏愤慨，来到现场，与包兴旺碰面时说：“秀才人情纸一张，请笑纳。”说罢递给孙一鸿一张红纸。草包知他是棚户区有学问的教书先生，尽管没出钱，总算给了面子，想留他吃饭，可没留住，夫子领来“良民证”，拂袖而去。

孙一鸿打开红纸，上书 14 个大大字：“寒冬腊月刮秋风，百姓衣单不敢言。”

草包问，写的啥？孙一鸿念了一遍，还赞上一句，字写得极有功力。

草包笑着说：“有啥功力，冬天只有西北风，哪来的秋风？他是老糊涂啦！”

碍于保长面子，保干事不便当众解释“秋风”的含意。

朱家湾往事

许成章

